

郑子瑜的学术研究和 学术工作

宗廷虎 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郑子瑜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工作

宗廷虎 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沪)新登字 202 号

责任编辑 杜荣根

郑子瑜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工作

宗廷虎 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同济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230,000

1992 年 3 月第 1 版 199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309-00648-8/I·48

定价: 5.50 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系《名家论学》续集，仍为祝贺郑子瑜先生受聘复旦大学顾问教授而编，荟萃了郭绍虞、俞平伯、吕叔湘、张志公、胡裕树、蒋祖怡、张寿康、汪向荣、宋琪、林非等著名学者的论文 30 余篇，多层次，多方面地评估了郑子瑜教授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工作的成绩，其内容涉及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汉语和修辞学诸方面。有的探讨了对黄遵宪的研究；有的探讨了“仿拟”和“模仿”的关系；有的探讨了修辞学史；有的提出了“逐渐使用法”和“间隔使用法”的问题；有的商榷了语法和修辞的结合与沟通的问题，所有这些论文均有相当的理论深度和学术价值。

前言*

宗廷虎

我和子瑜先生的交往，是从8年前的学术通信开始的。那时候子瑜先生还在日本的大学讲授修辞学，他的《中国修辞学史稿》快要完成了，而我正在着手修辞学史课题的研究，恰好《复旦学报》发表了子瑜先生的《王充论修辞》一文，我读后既佩服文章的扎实，但在某些观点上又有自己的看法，就与李金苓合写了一封长信（当时我用了“易蒲”的笔名）向子瑜先生请教。^①信是由《复旦学报》编辑部转往日本的，不料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收到了复信。复信除热情洋溢地表示感谢，同意我们的观点，并准备将我们的信和他的复函在《史稿》中作为附录刊登外，还进一步想把他所写的50万字左右的《中国修辞学史稿》的初稿寄来要我们“细阅”并提出意见。子瑜先生是我们的前辈，早在60年代，他的《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刚出版时，我们就听到过陈望道老师的赞扬，现在他如此虚怀若谷地不耻下问，使我们深为感动。当时因他事所扰，只能婉言谢绝。这可说是我们交往中的一个良好的开端。

此后在多次的通信中，我逐渐了解到子瑜先生学识的渊博，他不但精通汉语修辞学史，还深谙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尤

*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语法修辞研究室主任，副教授。

其是他的黄遵宪研究，在国内外久享盛誉。1985年他应邀来复旦参加全国首届“语体学学术讨论会”，我们才第一次见面。几次交谈后，更感到他研究的面十分广泛，而所有这些成就，又都是在苦学和独立钻研的情况下取得的，这是多么不容易！香港王希珊女士在《传奇学者郑子瑜教授访问记》一文中曾引用子瑜先生的自述，说他多少年来为了解决“口腹”问题只得从事繁重的非学术性工作，这些工作已逼得他“喘不过气来”，但“为了进行研究和写作”，他却情愿“剥夺可观的休息和睡眠时间，作生命的透支。”^②这些事迹是非常感人的。于是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即在编了《名家论学》这本纪念子瑜先生获聘复旦大学顾问教授论文集后，再编一本《郑子瑜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工作》，把各家对于子瑜先生从事的多门学术研究的评论集中起来，让读者就诸如《中国社会科学家传略选》（见《晋阳学刊》）、《传记文学》、《北京图书馆文献》以及《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等书刊中去对照他的大半生拚搏不懈的事迹，这肯定能给我们——包括编者本人在内——以更多的激励和启迪。这就是此书的编辑动机。

这本书有以下的特点：一是作者有不少是知名学者，如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张志公、胡裕树、张寿康先生，著名文章学家蒋祖怡先生，著名文学批评家、文艺理论家郭绍虞、俞平伯、林非先生，著名红学家宋淇先生，著名历史学家汪向荣先生等，都撰写了文章或提供了信函。二是作者的面广，有研究语言学的，有研究文学的，还有研究史学的。搞语言学的作者中，有专门研究修辞的，有侧重研究语言学中其它分支的。搞文学的作者中，有专门研究古典文学的，有专门研究现代文学的。作者既有国外的，如联邦德国的Harald Richter（李浩然）先生，撰稿时在日本的林景渊先生，也

有在香港的，如宋淇、梁通、潘铭桑、李谷城先生等；更多的是在祖国大陆的，如吴士文、郑远汉、王希杰先生以及上海和复旦大学的一些先生等。从作者的面，也可看到子瑜先生探讨的学问，是引起了多种学科学者的兴趣的。

本书也选入一些学术观点与郑先生不同的文章。这是由于郑先生的提议，他并亲自从《修辞学习》选出有关的几篇，还有个别作者写信或寄论文和郑先生商榷，郑先生也转寄给编者，嘱编者能为之编入。郑先生这种乐意接受批评的态度，尤其值得我们取法。

全书文章分为以下几组：第一组是对子瑜先生有关古典文学——主要是黄遵宪研究和现代文学研究所作的评论。第二组是子瑜先生在《修辞学习》杂志上发表了有关“语法修辞结合论”的公开信后，国内学者热烈反响的复信。这儿发表的14封，绝大部分在吴士文先生主编的《营口师专学报》“修辞学专栏”上发表过；另有一些选自《修辞学习》。第三组主要是有关中国修辞学史的，前3篇评及《中国修辞学的变迁》，后数篇评论《中国修辞学史稿》，末篇是宋淇先生和子瑜先生的学术讨论通信。最后一组为总论、杂论和访问记。作者简况在每篇文章的题注中予以简介。

本书是继《名家论学》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有关纪念郑子瑜先生受聘为复旦大学顾问教授后的第2本论文集。编者在此谨向该社的徐余麟、吴德润、杜荣根等同志对本书在编印过程中的大力支持和辛勤劳动表示诚挚的谢意！

1988年1月于复旦大学

注：

- ① 详见郑子瑜先生为拙著《汉语修辞学史纲》所写的《序言》，该书由易蒲、李金苓合著，吉林教育出版社1989年出版。
- ② 香港《明报月刊》1987年6月号。

目 录

前 言	宗廷虎 (1)
-----	---------

序《鸿轩论学》——一名《郑子瑜与浙江文学家》	俞平伯 (1)
------------------------	---------

一部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宝贵资料

——《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	汪向荣 (3)
------------------	---------

郑子瑜与黄遵宪研究	梁 通 (12)
-----------	----------

评郑子瑜的黄遵宪研究	曹 旭 (38)
------------	----------

海外偏留文字缘	杨天石 (53)
---------	----------

中日文人以文会友的往事	林景渊 (57)
-------------	----------

《〈阿Q正传〉郑笺》后序	林 非 (61)
--------------	----------

筚路蓝缕 功不可没

——略谈郑子瑜的《鲁迅诗话》	陈子善 (67)
----------------	----------

研究郁达夫诗词第一人	陈子善 (72)
------------	----------

对郑子瑜先生《语法修辞结合论行得通吗》公开信的

复信	吕叔湘、胡裕树、张志公等 (78)
----	-------------------

郑子瑜先生公开信内容简介	吴士文 (97)
--------------	----------

谈语法与修辞的关系·····	张寿康 (98)
语法修辞的结合问题·····	吴士文 (103)
语修结合纵横谈·····	郑远汉 (108)
语法修辞结合问题值得探讨·····	林文金 (117)
语修沟通管见·····	邢福义 (123)

研究现代汉语修辞学的几点体会——兼评郑子瑜

《中国修辞学的变迁》·····

·····〔联邦德国〕Harald Richter (李浩然) (129)

难能而可贵的探索——读《中国修辞学的变迁》····· 濮 侃 (142)

《中国修辞学的变迁》与《修辞学发凡》····· 邓明以 (148)

《中国修辞学史稿》序····· 郭绍虞 (157)

评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兼论中国修辞学史

的研究····· 易 蒲 李金苓 (161)

郑子瑜和中国修辞学史····· 王希杰 (171)

郑子瑜及其《中国修辞学史稿》····· 陈亚川 (189)

关于研究修辞学史的一些想法····· 陈光磊 (197)

诗话修辞论的新开拓——评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

稿》中关于诗话的修辞论····· 易 蒲 李金苓 (209)

鲁迅所说的近视眼故事原来出自崔述的《考信录》

——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读后····· 李谷城 (217)

关于《典论·论文》中“齐气”一词的正义····· 蒋祖怡 (222)

论“仿拟”与“模仿”——兼向郑子瑜先生求教····· 邹光椿 (226)

王世贞在批评刘长卿吗?

——谈谈《中国修辞学史稿》中的一个失误·····	李祥林 (235)
我对“猩猩能言，不离禽兽”的看法·····	吴稚甫 (238)
与郑子瑜先生论“偏义复词”——兼论“逐渐透露法” 和“间隔使用法”·····	[香港]宋 淇 (241)
附郑子瑜致宋淇先生的信·····	(245)
《郑子瑜论学杂著》先睹记·····	潘铭桑 (247)
茫茫文海出奇缘——《郑子瑜墨缘录》前言·····	龙协涛 (254)
心灵的沟通——记陈望道与郑子瑜两位修辞学者 的“相重”·····	林兴仁 (261)
访著名修辞学家郑子瑜教授·····	江 夏 (267)
郑子瑜入选《前五百名人物手册》·····	吴东南 (272)
为沟通海内外文化不懈努力——访新加坡籍 华裔学者郑子瑜教授·····	吴奕纯 (275)
吹尽狂沙始到金——访香港中大郑子瑜教授·····	方 璞 (277)

序《鸿轩论学》*

——一名《郑子瑜与浙江文学家》

俞 平 伯

杭州大学教授华宇清先生著《鸿轩论学》一书(一名“郑子瑜与浙江文学家”),评述郑子瑜先生论鹭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陈望道、丰子恺、蒋祖貽及我七个浙江同乡的作品,除鲁迅外,兼叙与我们的交谊。

我和子瑜先生的交往,始于五十年代,是经知堂师的介绍,要我为他的选集题签,并向我索书,感于他的热情,皆应之。此后稀稀疏疏地通了些信,却始终未能晤面。1987年,我应邀往香港,主持《红楼梦》讲座。行前,得子瑜先生远地来书,并附一绝云:

合浦还珠已可期,先生来此正当时。

十年枉被狂徒议,无损真金忽与鳌。

诗虽承赏,然过誉之词,实不敢当。我到香港后,他复在《明报》发表文章,以示欢迎;更与一些港台作家及中大的友人设素食殷勤款待,谊厚情深,于此可见。

此书系据实之作,夹叙夹议,集史料、学术和文学于一体,别具一格,颇有些价值,值得一读。

* 作者原系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已故。

作者要我为撰序文，因年老手颤，不能执笔，口述数言，命外孙韦柰代笔，勉为序。

1990年3月16日于北京

子瑜案：前年秋天，杭州大学教授华宇清先生来香港，说他准备编写一本《郑子瑜与浙江文学家》的书，希望能在大陆和台湾同时出版。我以为这样的书名对我来说未免太夸张了，建议以《鸿轩论学》为正书名，原书名则降为副书名，他接受了；后来我又建议在台湾出版的以《鸿轩论学》为正书名，在大陆出版的则以《心灵的沟通》为正书名，以示区别。华教授也同意了。今年初，华教授来信说书稿将要杀青了，要我写一篇序文。我说全书都是写我的，由我来写序文似乎不合适，乃提议改请俞平伯先生写序。于是华先生写信给俞老，我也写信给俞老。俞先生虽在卧病中，又在精神恍惚中，却也欣然应允，口述数言，由外孙韦柰代笔，自己也签了名，勉为序如上。可见他对晚学的厚爱，同时也留下了极其难得一篇最后遗作，因为过了两三个星期，俞老病情转恶，连话都不能说了。

1990年10月31日郑子瑜附记于香江。

一部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宝贵资料*

——《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

汪 向 荣

1979年我恢复名誉后，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篇介绍黄遵宪日本杂事诗最初稿冢的短文，想不到发表后不久，就收到很多多年不知消息的师友们的来函，其中包括实藤先生。

实藤惠秀先生是我40年代初，在日本留学时相识、以后又共同从事中日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友人（也可说是师长）。彼此间鱼雁往来，讨论学术，从未间断。1957年后中断了一段时间，到1962年又恢复，直到文革后，才完全停止。后来他来信说，见到文章知道我还健在，而且还在谈黄遵宪，他很高兴，又谈到他20年来的情况，最后要我对他寄来的三本书（《中国人日本留学史》、《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日中非友好史》）提出具体的意见。他的著作，向来是出一本就送我一本的，可是这三本我却没有收到。因此我在回信中说明了不可能收到的情况，请他再寄，还问他《遗稿》是不是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研究员。

我们在1943年见到的笔谈稿。很快收到了他的回信，并说除《遗稿》因手头无书，要稍等外，其他两本又寄出了，还说《遗稿》就是你见到的，但多得多了。又说，你是第一个见到笔谈原稿的中国人，无论如何希望你谈一下你的看法。这次收到了《日中非友好史》，不知道为什么《留学史》仍没有收到。

对我来说，对《留学史》的关注，远过其他，因此3、4个月之后，眼见不可能再收到时，又给他去了信，希望再寄一本《留学史》，也提到了《遗稿》。1978年我恢复研究工作的前夕，收到了他寄过3次的《中国人日本留学史》和第二次寄出的《黄遵宪与日本友人笔谈遗稿》（以下简称《遗稿》）。

我很认真的读了这两本书，给他提出了相当尖锐的意见，记得对《遗稿》是这样说的：

黄遵宪是中国近代史上以革新见称的人，他的革新思想，主要是在日本几年中形成的，这在《日本杂事诗》中，已有所流露，我想在《遗稿》中一定更多，可是很失望，除了些风花雪月的闲谈以外，就没有什么可观的了。最后说：“这怕不是黄的本意吧！”实藤接信后，很快回了信，说笔谈就这样，总不能伪造，而且或多或少还是能发见其思想转变的脉络。又说《遗稿》的整理校订，主要由郑子瑜先生担任，开始时，郑先生也提到这点，但原文如此，无能为力。最后再一次提到：“你作为第一个和唯一的一个见到笔谈原件的中国人，希望能将它介绍到中国大陆上去，为我们数十年共同从事的中日文化交流工作出些力。”遗憾得很，一直到他死时，我没有完成他的愿望。

见到《遗稿》，我不能不想到40年前的往事。尽管我已由红颜青年变为皓首老人，但往事仍一一映在我脑中。1943年11月底，因

已决定回国，到东京去料理些私事。到东京，照例要和实藤先生见面。就在那次，他从书桌上取出几本比 16 开杂志小一些的线装本给我看，还郑重其事的告诉我，这就是从平林寺中借来的源桂阁和清国公使馆人员的笔谈稿。我翻了 2 小时左右，发现这位源侯、笔谈稿的主人是位有心人，一开始就准备把这些零碎的笔谈稿装订成册，所以纸的大小一律，书写的范围，也大致相同；而且每次笔谈都用朱笔注明页次、人物代字和动作说明，使后人一见就能了然。装订也很讲究，首尾两页夹层中，还夹有整张的烟叶，以防虫蛀，显然，他是想长期保存的。那就是我第一次接触笔谈稿，以后又陆续从书信中知道笔谈主人源桂阁的身世，和参与笔谈者的大概情况，同时也探讨过一些过分潦草的笔迹。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是晚清时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中最宝贵的资料，我建议他，一面看一面译，准备日后公开出版。

12 月下旬，我回国的前几天，实藤先生提了个小包袱，专程从东京到神户来看我，说以后不一定再能相见，所以把新借到的笔谈稿带来让我看看。那天我们谈得很晚，主要谈的是笔谈稿，研究其潦草的字迹，谈论源桂阁的性格和明治初年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向往等等。

次年 10 月，我又来到东京。当天傍晚，实藤先生就来旅馆看我，这次给我的印象很深，因为他穿了战时服，打了绑腿，手提一小包袱来的。一见面就说是从工厂来，来不及回家换衣服，小包袱中是笔谈稿和饭盒、水瓶。他说这是他目下外出随身必携的，又说家属已疏散到了广岛，学校也不上课，但每星期要带学生去勤劳奉士 4 天；工厂在蒲田，离他家很远，因此一出来就 1 天。那天共进晚餐后他就回去了，约定明晨再去找他。

第二天一早，我上他家，家中只有他一人，书桌上堆满了书稿，还放着昨天他带到旅馆的小包袱。谈着，他打开小包袱，还是昨天见到的那些。他说，无论什么时候这小包袱随身带着，上防空壕也这样，因为这几本笔谈稿比生命还重要。接着，又讨论起笔谈稿中的一些问题，我仍鼓励他译出，他说想先抄录，然后再译。

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见面，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笔谈稿。回国后不断有书信来往，开始谈的还集中在笔谈稿上，后来就很少谈到了，我想大概笔谈稿太多，他不搞了。1963年左右，他来信说，要把笔谈稿摘要出版，还说要在书中提到我。他有一个习惯，凡对他工作有过帮助的，在出版成果时总要一提，以示感谢。这本来也不算什么，可是那时我的处境很不妙，为了避免麻烦，曾两次去信要求他免提。因此，一直到1978年为止，他出版的著作中，都没有提到我。

我和笔谈稿的因缘就这样，他一再提到我是第一个见到这批笔谈稿的中国人，这是事实。但我所见到的，仅14本而已，比起后人来（即使是复制件），要少得多。

老实说，开始我对《遗稿》是很失望的，就像我1944年和实藤谈话中提到的，黄遵宪是戊戌政变参加者，其思想上的变化，是在他出使期间形成的、定型的。担任日本使署参赞那段时间，更为重要。我想应该在笔谈稿中见到一些端倪，因为我曾在档案中见到过刘寿铨和当时兵库县知事周布公平、马相伯、郑孝胥和日本人的笔谈稿，可是当时我在10多册笔谈稿中却没有发现，实藤先生也感到奇怪。不过当时我们见到的还少，所以把希望放在后来的那些上。可是当我见到《大河内文书》和《遗稿》中，仍是些风花雪月的身畔琐事时，就禁不住向实藤先生提出了疑问。他也知道并见到过神户

理事府的旧档,其中有不少理事和日本人的笔谈稿,尽管纸张大小不一,但内容却不尽是风花雪月,更没有男女之私。为什么在源桂阁这样大量的笔谈稿中,竟绝大部分是生活琐事呢?

事后一想这也完全是正常的,何如璋,黄遵宪,当时都是代表国家的外交官,私人间的往来笔谈,自不可能涉及公事。源桂阁虽是华族,但当时并无一官半职,完全以私人身份和清国公使馆人员交往的,因此他们的笔谈,自不会涉及时事。黄遵宪是不是和日本人之间,有另一种性质的笔谈?肯定是有,只是没有保存在私人文牍中而已,可能就在东京使署档案中,但现在已无存了。源桂阁和黄遵宪笔谈中,偶而也涉及时事,但真如凤毛麟角,太少了。(见笔谈稿 29 页)

身边琐事,尤其是涉及男女之私的,向来为中国封建士大夫所讳言;日本受中国儒教文化渗透很深,所以也这样。其实,食色性也,人之大欲,青年男女谁个不谈,只是在旧礼教束缚下,掩耳盗铃而已。黄遵宪他们以而立之年,长期离家,在和熟人之间谈到这些事,也是情理之常;掩饰并不能说明他们不谈,源桂阁把这些笔谈稿保存下来,已是了不起的事。现在《遗稿》的两位编校者,特别是中国血统的郑子瑜先生敢于冲破樊篱,一字不遗的把这些笔谈稿整理出来,在《遗稿》中公布,实在是件了不起的事,特别是在正确理解黄遵宪的为人方面,提供了最真实的资料。

人都有私生活,私生活看起来是件小事,或许还有人认为男女之私是见不得人,上不了桌面的。可是,即使作这样想的道学先生也不能不承认,私生活足以影响、甚至左右一个人的全部,因此对一个人的观察了解,也不能忽略了这不受重视的私生活。以黄遵宪为例,谁都知道他是外交家,思想家,但实际上他也是个多情善感